

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案

江永红◎著

虎魂

(下部)

1950



黄河出版社

014036364

新中国大剿匪秘密

I253.2
287
V2

江永红◎著

虎豹

(下部)



北航 C1715745

黄河出版社

策划/主编◎张 勃
责任编辑◎武景生 张宪峰 葛 玮
装帧设计◎张 勃 张宪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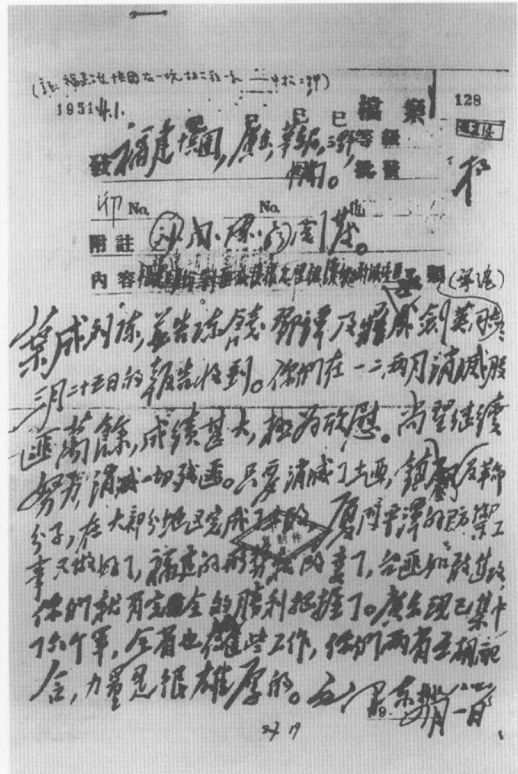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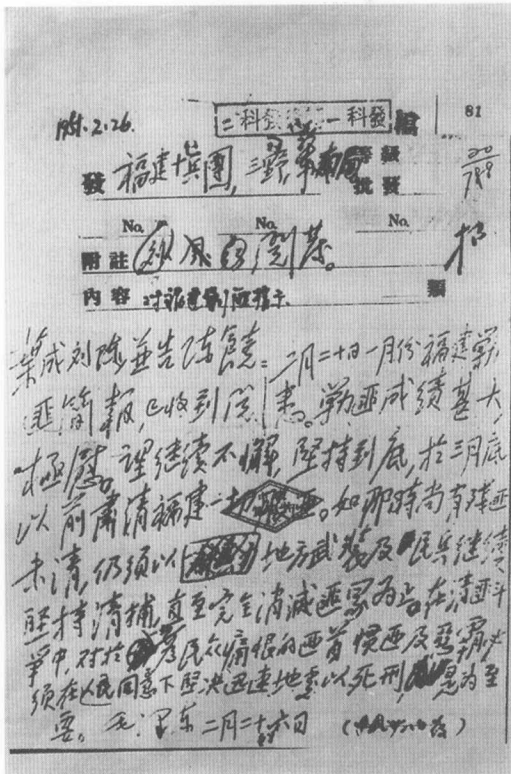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灰霾 1950:新中国大剿匪秘密档案·下部/江永红
著.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460-0487-7

I. ①灰… II. ①江…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0036 号

书 名 灰霾 1950(下部)
著 者 江永红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发行部 (0531)82058166 82904707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787×1092(毫米) 1/16
25 印张 3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0-0487-7
定 价 4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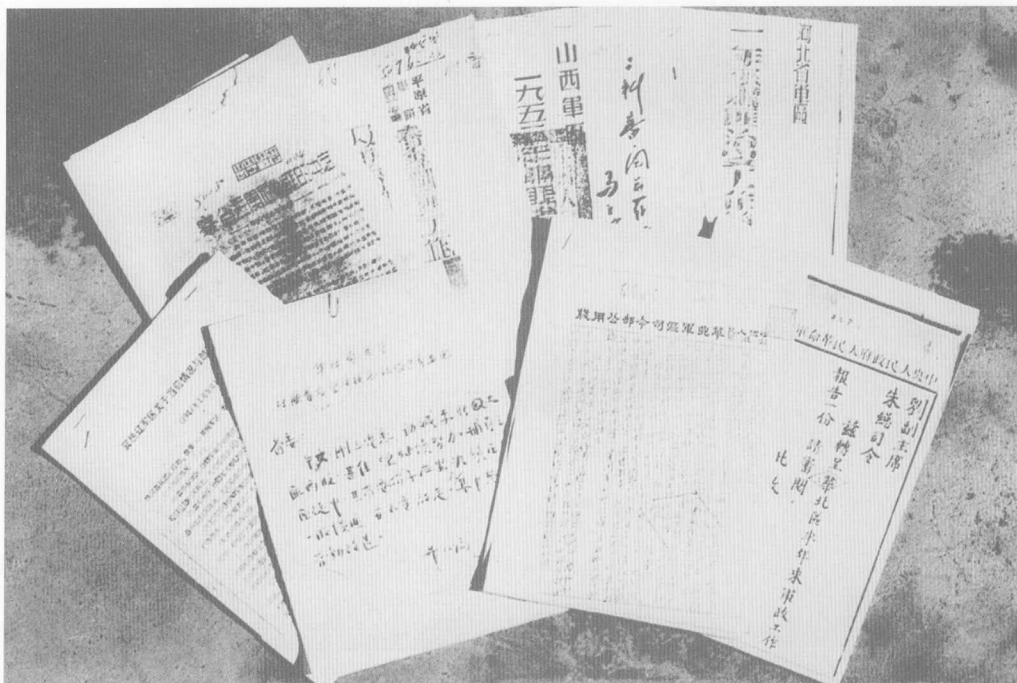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对华东地区剿匪斗争十分关注。图为毛泽东起草的两份关于福建地区剿匪斗争的电报手稿。



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组织指挥剿匪斗争中上报下发的部分文件。



中南军区司令部及时通过军区机关报《战士报》发布剿匪战绩公报，鼓舞部队剿匪士气。



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和中共华北各省委、省政府、军区关于剿匪斗争的部分文件。



绥远军区剿匪部队战士正在张贴省人民政府、军区发布的剿匪布告。



滇东平彝（今富源）剿匪部队召开军民大会，动员军民同心协力，共同肃清匪患。



第3军剿匪部队的战士们从险要的当金山口冲破瘴气，翻越雪山冰川，追击残匪。

不能淡忘的一段历史

有一段历史正在渐渐被人们淡忘，由这段历史得出一个历史结论也随之被人们淡忘。

这一段历史，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剿匪斗争；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消灭了匪患。

正因为匪患绝迹已久，现在的人们已不知匪患为何物。对土匪的了解多是通过电影和电视剧，如《林海雪原》《乌龙山剿匪记》等等。有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业，把过去的匪巢开发成旅游景点，让游客装扮成土匪，玩一回警匪大战，因此很多年轻人甚至觉得土匪很好玩儿。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很多老人特别是匪患严重地区的老人，说起匪患却至今心有余悸，因为土匪的残忍让他们刻骨铭心，往事不忍重提。作者的出生地是湖北的江汉平原，与山区相比，旧社会的匪患要轻得多。夏天村民们在打谷场乘凉时，儿时的我常听大人们说，共产党特别有两样好，一样是不用躲土匪了，一样是不怕淹水了（水灾）了。就是说，共产党消灭了匪患和水患。少不更事的我看过《水浒传》，也听老师讲过一点政治历史知识，便自以为是地与大人们辩论起来，说土匪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诬蔑，梁山上的宋江就仗义疏财，人称“及时雨”。伯父气得差点没有打我一巴掌。后来我才从别人口中知道，伯父当时为什么会如此动怒。原来我的父亲就被土匪绑架过，并且险些丢掉了性命。土匪绑票不是只绑富户吗？我们家是贫农，怎么也会被绑票呢？事后方知，是本村一个恶霸为报私怨设计了借刀杀人的诡计。而一旦被抓走，土匪才不管你是穷是富，骨头也得熬出二两油来。在被折磨得奄奄待毙之时，幸好关押他的那户人家恰好也姓江，念在同姓的份上，夜间乘土匪赌博之际，悄悄将他放走了。十多里地，他是一

路爬回来的，爬到离家还有两三百米的一块湿地时，再也爬不动了，伯父似乎听见有人在远处喊“哥”，打着灯笼去找，叫人一起用门板将他抬回家来。虎口逃生的父亲回来后在村里也不敢呆，未等伤愈就躲到外地去了。在我们那个并不大的小村子里，遭受土匪戕害的远不止一家。有次躲土匪，一个小孩儿哭，大人就用棉絮堵住他的嘴，等土匪走后一看，孩子被活活憋死了。前面所说的那个恶霸，在贺龙红军长征后，勾结土匪，当上了“铲共中队长”，回到村里大开杀戒，有好几家被杀绝。不是枪毙，而是被砍头，如想保全尸，就得拿钱来，改砍头为淹死。被杀头者中，就有我的堂伯，他是共产党员，当过农会主席。但是，许多被杀的人其实与共产党根本不沾边，就因为拿不出钱来“孝敬”那些杀人魔王。杀人之多，让国民党驻军的一个团长都惊讶不已，骂那个恶霸说，你把人都杀完了，将来谁给你种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这些土匪武装也尽量争取。有一股势力较大的土匪是以散兵游勇为主组成的，因头子姓陈，故号称“陈部”。李先念当时是新四军五师师长，所部活跃在鄂豫皖敌后。他手下的一个政委叫方尚武，是我们村的人，去与“陈部”谈判，“陈部”答应接受收编，可当方政委如约前去收编时，这些家伙却突然翻脸不认人，竟将方政委乱枪射死，接着就打出了伪军的旗号。这些土匪有奶就是娘，见当时日本人势力大，便不惜当汉奸，帮日本人打新四军。我高中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是新四军的指导员，解放战争时奉命带部队剿灭这股盘踞在渔薪镇的土匪，不幸英勇牺牲。这次战斗，除匪首以外的土匪全部被歼。匪首本已被包围在一栋临街民房的二楼上，但他突然从窗户跳到一匹战马背上，身子贴着马背策马狂奔，因街道上人多，部队怕误伤群众而不敢随便开枪，让匪首侥幸逃脱。

上述虽然只是旧中国土匪情况的只鳞片爪，但多少反映出土匪的一些特点，同时，由于受害者是作者的亲人至少也是身边的人，又都是村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所以比从书本上看到的更加让我记忆深刻。穷地方出土匪，山区和边区出土匪，这大概是一个规律。如前所述，我的家乡江汉平原在农业社会算是富庶之地，所谓“湖广熟，天下足”也，既非山区也非边区，旧社会匪患尚且如此厉害，何况那些著名的匪窝呢？当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全国的匪患后，发现我们村的那点情况与匪患严重的地区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旧社会有一句成语，“兵来如梳，匪来如篦。”篦就是篦子，如今已经成了古董，只有在民俗博物馆和词典上才能见到了。篦子其实是一种比梳子齿更密的梳子，密得只容一根头发丝过去，用于清理头发中的虱子和头皮屑。“匪来如篦”就是抢劫不

分贵贱一扫而光，有时连老百姓的锅碗也不放过。老一代的村民告诉我，反动军队包括日本人来了还可以人躲起来，把东西藏起来，而匪来了，东西往往是藏不住的。因为土匪是地头蛇。伯父曾经给我举例说明，本村一个富农怕粮食被抢走，便将一皇桶（可装千斤的大木桶）稻子埋在一贫农的竹园里，结果照样被土匪挖走了。这就是说，坚壁清野只可以对付兵，却对付不了匪。

《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在谈到创作动机时说，他晚上加班回家，每当看到妻子和孩子熟睡的情景，就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就想起他剿匪时的战友。他是否有些神经过敏了？老婆孩子睡得安稳，这么个事，就能让你感到幸福？幸福感也太容易满足了吧？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他的身世和经历之后，我们就会觉得他的上述感受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小说《林海雪原》中的故事并非都是虚构，包括作者在内的正面人物如杨子荣和反面人物如座山雕等都是真实存在的。这部小说只不过是艺术加工，让这些真实的故事更加集中（把几个人的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把几次发生的事集中在一次），更加生动而已。据与剿匪部队的战斗记载对照，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找到出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找到模特儿。在某种意义上说，《林海雪原》基本上是一部纪实小说。如果你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个老百姓，或者是剿匪部队中的一个战士，就会与曲波有同样的感受。

幸福是什么？就是对渴望的满足，渴望愈强烈，得到后的幸福感就愈强。对于经历过旧社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能够有一个和平劳动的环境，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晚上能睡一个安稳觉，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人身安全是最基本的人权，是人的第一位的最基本的心理需求，而最基本的东西往往是最大的。没有安全保障，即使腰缠万贯，又有何幸福感可言？

中国的匪患可以说由来已久，自从有了阶级压迫，就有了土匪。不过，在清代以前，还没有土匪这个词儿，土匪不叫匪，而称之为“寇”“贼”“盗”。“匪”这个字主要作“非”字用，另外还是“筐”“斐”“菲”等的通假字，即使是“匪人”一词，也是指不亲近的人，到清末才引申为指行为不端的人，进而直指土匪。到民初，“匪”字其他用法与现实和口语渐行渐远，而主要用来指土匪、海匪、烟匪以及五花八门的匪了。我们无意在这里做文字考据，只是想说明在旧社会，历朝历代都不乏土匪，即使在所谓盛世也有不少土匪，并且历代统治者都没法从根本上消灭土匪。只能说盛世土匪少，匪患轻；乱世土匪多，匪患重。一方面，匪患是社会的毒瘤，而另一方面，剥削制度又是产生土匪的土壤。翻开一部二十四史，虽然封建史家们

本着孔夫子“为尊者隐”的修史原则，对匪患的记录可谓惜墨如金，但即便如此，有关寇贼的记载仍然让人目不暇接。我们不能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把所有的农民反抗压迫的武装统统称之为寇贼、土匪，也不能不加分析，把所有的非政府武装一概视之为农民起义，因为其中许多根本不是什么义军而就是土匪。而且，即使在一些农民起义军中，也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土匪习气。《水浒传》中的好汉大秤分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李逵的两把大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杀的难道都是贪官污吏？明末的张献忠杀人如麻，把四川杀得十室九空，是义军还是土匪？有时候你很难分得清。尽管土匪古已有之，史不绝书，但清末民初之后，特别是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是中国匪患的又一个最高峰，这是确定无疑的。新中国成立前夕，新解放区可以说无处无土匪，土匪遍四方。成千上万股的各类土匪割据一方，各有各的地盘，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土皇帝，即老百姓所说南霸天、北霸天，是广大乡村特别是偏僻乡村的实际统治者。

从一般意义上说，土匪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非法武装集团，但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尤其是在蒋介石政权灭亡前夕和逃到台湾之后，国民党事先潜伏下来的特务和派遣潜入的特务，大量收编土匪为反共武装，委任匪首为司令、军长、师长、团长、支队长，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土匪武装都有国民党的背景，或者直接为特务所掌握。有些土匪武装甚至是美帝国主义直接训练和掌控的。陈云在东北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时曾经说，东北的土匪都是政治土匪。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土匪都是政治土匪，纯粹的经济土匪已几乎归零。所以，剿匪斗争已经不是一般的维持社会治安的问题，而是成为与国民党反动派较量的一个重要部分，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从解放战争开始就全力剿匪，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剿匪斗争以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5月起到1953年止。整个剿匪斗争，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土匪260余万（1949年5月前不含），为根治匪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消灭了匪患。

可惜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渐渐开始淡忘，讲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党史和军史，只讲消灭了国民党807万军队，而很少讲剿灭了260余万土匪。新中国成立前只讲三大战役，讲百万雄师过大江，新中国成立后只讲土改、讲抗美援朝，讲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而不讲剿匪，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似乎新中国一成立国家就安定了，就转入和平建设了。这是一个对历史的误读。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面临的是一场血色之晨，枪声一直响个不停，直至1953年土匪被剿灭为止。血色的晨光，剿匪斗争是浓重的一笔，甚至可以说是基础色。人民解放军的6个兵团共抽调140多个师、2个旅另20个团以及部分海军的主力部队共150多万人，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经过四年艰苦作战，才最终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它既是解放战争的继续之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军事上的最后一战，又是新中国的固本之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清场之战。舍此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没有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就没有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的巩固，就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

剿匪斗争的伟大意义，更在于这场斗争让没有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逐步学会了执政。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但对许多干部来说，执政的角色转变不是在欢呼新中国成立时，而是在剿匪斗争中完成的。由于解放战争后期进展神速，国民党兵败如水，新解放区很多地方的政权是在我准备不足甚至来不及准备的情况下接管的，加上胜利之师未免会产生的骄傲自负，所以立足未稳就匆忙进行社会改革，结果诚如毛泽东所说的“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0年春节之后，上海等大城市出现了经济危机，农村出现了新一轮的匪患高潮，成千上万的征粮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倒在匪特的屠刀之下。在城市打退危机，农村平息暴乱的过程中，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所讲的“不要四面出击”。在某种意义上说，匪特倒逼我们要提高执政水平。

剿匪斗争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政治争取只是“七分政治”中的一部分，最根本的是政治路线、战略策略和各项政策。剿匪斗争是一种军事行为，更是一种执政行为。它与退租退押、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是几乎同时或者先后交错进行的。剿匪是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又有赖于其他工作的保证或配合。比如，要完成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土改是一个主要任务和根本标志，而要土改，必先剿匪，否则土改就没法进行；同时，不进行土改，就没法彻底消灭土匪。1951年，毛泽东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称为“三大运动”。三大运动，每一个运动都是以剿匪为前提的。毛泽东关于剿匪和与剿匪有关的批示、电报文稿，作者见到的仅1950年就有30多篇，1951年有100多篇（多与镇反相关），可见其重视程度。

剿匪斗争大多是由一些战斗，包括一些小战役所组成的，不像解放战争中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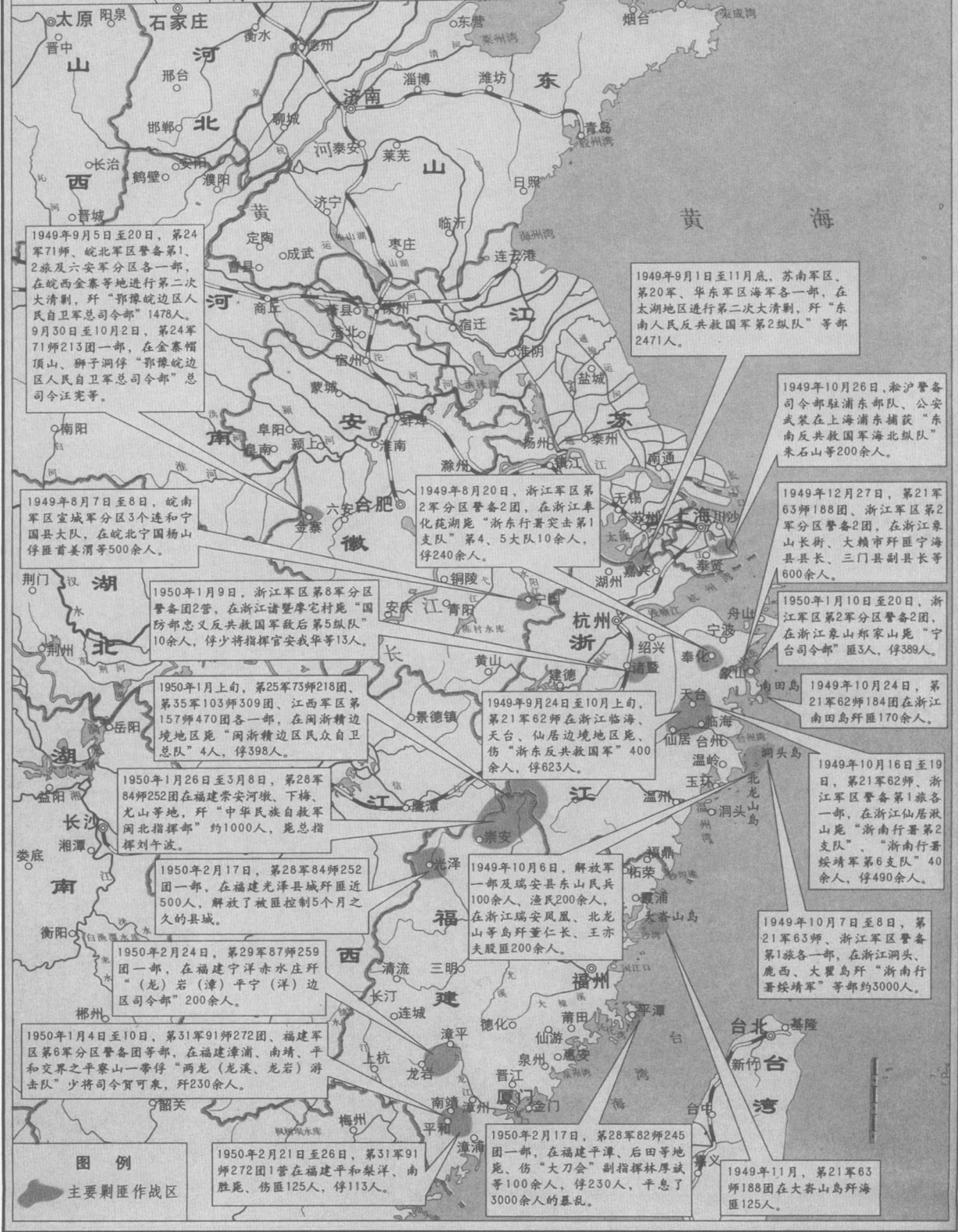
战役那样万炮轰鸣，气吞山河，因此有人觉得剿匪斗争是小打小闹，不过瘾。其实，剿匪斗争的激烈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因为匪首都是一些铁杆反共的死硬分子，又有其长期盘踞的巢穴，在保全其巢穴的最后战斗中，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狂和坚韧。因此，对我军基层指战员来说，剿匪要比打大战役难得多，四野有的指战员从东北打到两广，一路高歌，却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剿匪战斗中。作者不掌握整个剿匪斗争中我军总的伤亡数字，但据第19军兼陕南军区统计，所属3万将士，歼匪2万余名，牺牲官兵2200余人（不含伤）。各部队的情况不同，不能按这个比例来推算，但管中窥豹，可略见一斑。

土匪是旧中国的一大特色，不了解土匪就不懂旧中国国情，土匪现象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民族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剿匪斗争等于读一本百科全书，而研读这部百科全书，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无裨益的。

综上所述，我们今天重提剿匪斗争，绝不是为了说剿匪而说剿匪，而是想从中看到历史的经验。鉴于关于剿匪的研究本来就不多，并且多是讲具体的故事，本书无立说之野心，有吆喝之诚意，如能抛砖引玉，其乐也融融。

华东地区剿匪作战示意图(第二阶段)

(1949年8月—1950年2月)



1949年9月5日至20日,第24军71师、皖北军区警备第1、2旅及六安军分区各一部,在皖西金寨等地进行第二次大清剿,歼“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1478人。9月30日至10月2日,第24军71师213团一部,在金寨帽顶山、狮子洞歼“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汪宪等。

1949年8月7日至8日,皖南军区宣城军分区3个连和宁国县大队,在皖北宁国杨山俘匪首姜渭等500余人。

1950年1月9日,浙江军区第8军分区警备团2营,在浙江诸暨宅村歼“国防部忠义反共救国军”后第5纵队”10余人,俘少将指挥官安我华等13人。

1950年1月上旬,第25军73师218团、第35军103师309团、江西军区第157师470团各一部,在闽浙赣边境地区歼“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4人,俘398人。

1950年1月26日至3月8日,第28军84师252团在福建永安河墩、下梅、尤山等地,歼“中华民族自救军闽北指挥部”约1000人,毙总指挥刘午波。

1950年2月17日,第28军84师252团一部,在福建光泽县城歼匪近500人,解放了被匪控制5个月之久的县城。

1950年2月24日,第29军87师259团一部,在福建宁洋赤水庄歼“（龙）岩（漳）平宁（洋）边区司令部”200余人。

1950年1月4日至10日,第31军91师272团、福建军区第6军分区警备团等部,在福建漳浦、南靖、平和交界之平黎山一带俘“两龙（龙溪、龙岩）游击队”少将司令贾可来,歼230余人。

1950年2月21日至26日,第31军91师272团1营在福建平和梨洋、南胜等地,歼匪125人,俘113人。

1949年8月20日,浙江军区第2军分区警备2团,在浙江奉化苑湖歼“浙东行署突击第1支队”第4、5大队10余人,俘240余人。

1949年9月24日至10月上旬,第21军62师在浙江临海、天台、仙居边境地区歼、伤“浙东反共救国军”400余人,俘623人。

1949年10月6日,解放军一部及瑞安县东山民兵100余人、渔民200余人,在浙江瑞安凤凰、北龙山等岛屿歼董仁长、王亦夫股匪200余人。

1950年2月17日,第28军82师245团一部,在福建平潭、后田等地歼、伤“大刀会”副指挥林厚斌等100余人,俘230人,平息了3000余人的暴乱。

1949年9月1日至11月底,苏南军区、第20军、华东军区海军各一部,在太湖地区进行第二次大清剿,歼“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2纵队”等部2471人。

1949年10月26日,淞沪警备司令部驻浦东部队、公安武装在上海浦东捕获“东南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朱石山等200余人。

1949年12月27日,第21军63师188团、浙江军区第2军分区警备2团,在浙江象山长街、大横村歼匪宁海县长街、三门县副县长等600余人。

1950年1月10日至20日,浙江军区第2军分区警备2团,在浙江象山郑家山歼“宁台司令部”匪3人,俘389人。

1949年10月24日,第21军62师184团在浙江南田岛歼匪170余人。

1949年10月16日至19日,第21军62师、浙江军区警备第1旅各一部,在浙江仙居湖山歼“浙南行署第2支队”、“浙南行署绥靖军第6支队”40余人,俘490余人。

1949年10月7日至8日,第21军63师、浙江军区警备第1旅各一部,在浙江洞头、鹿西、大瞿岛歼“浙南行署绥靖军”等部约30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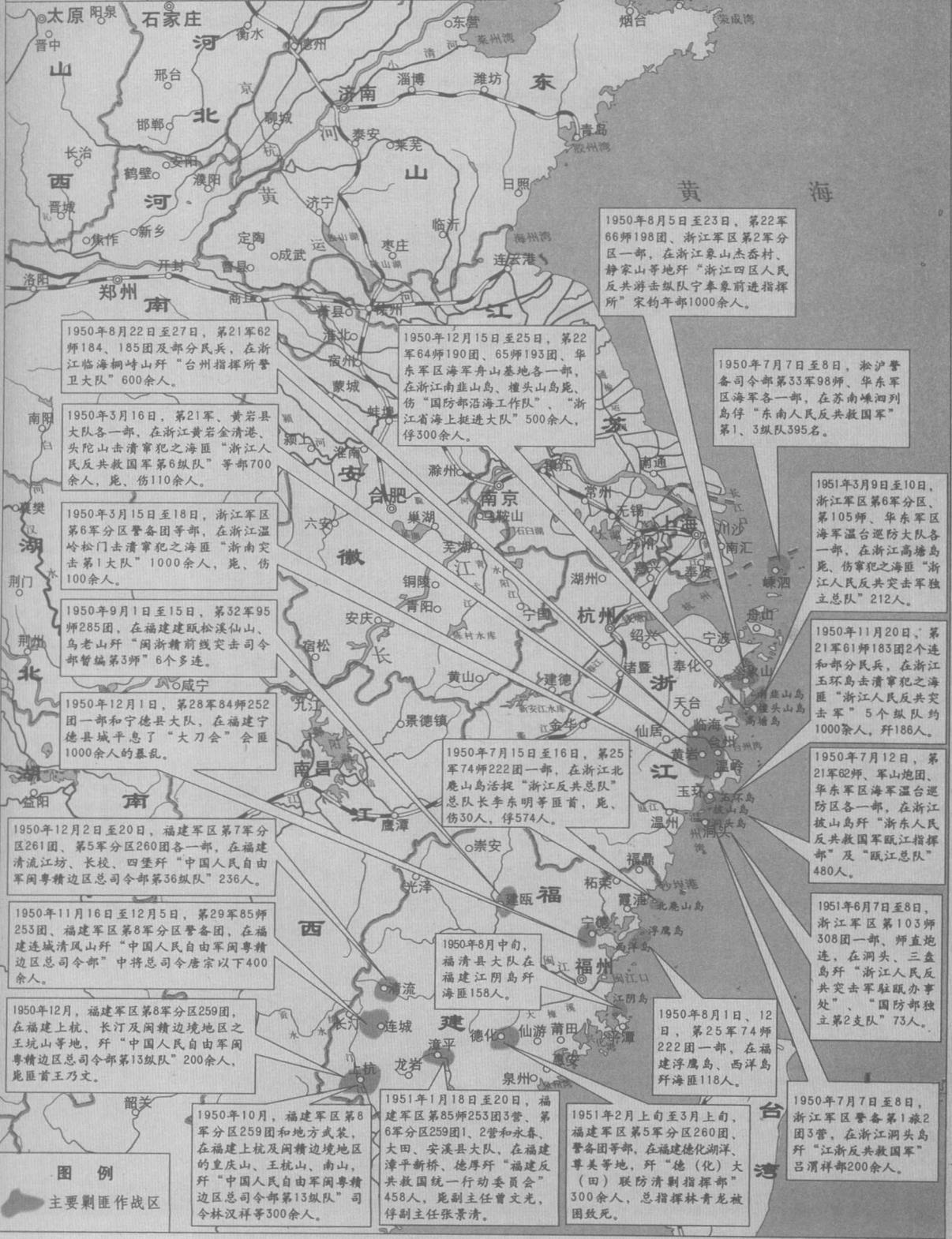
1949年11月,第21军63师188团在大嵎山岛歼海匪125人。

图例

主要匪徒作战区

华东地区剿匪作战示意图(第三阶段)

(1950年3月—1951年6月)



1950年8月5日至23日,第22军66师198团、浙江军区第2军分区一部,在浙江象山杰杏村、樟家山等地歼“浙江四区人民反共游击纵队宁奉泰前进指挥所”宋豹年部1000余人。

1950年8月22日至27日,第21军62师184、185团及部分民兵,在浙江临海桐峙山歼“台州指挥所警卫大队”600余人。

1950年12月15日至25日,第22军64师190团、65师193团、华东军区海军舟山基地各一部,在浙江南韭山岛、檀头山岛毙伤“国防部沿海工作队”、“浙江省海上挺进大队”500余人,俘300余人。

1950年7月7日至8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第33军98师、华东军区海军各一部,在苏南嵊泗列岛俘“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3纵队395名。

1950年3月16日,第21军、黄岩县大队各一部,在浙江黄岩金清港、头陀山击溃窜犯之海匪“浙江人民反共救国军第6纵队”等部700余人,毙、伤110余人。

1951年3月9日至10日,浙江军区第6军分区、第105师、华东军区海军温台巡防大队各一部,在浙江高塘岛毙、伤窜犯之海匪“浙江人民反共武装独立总队”212人。

1950年3月15日至18日,浙江军区第6军分区警备团等部,在浙江温岭松门击溃窜犯之海匪“浙南突击第1大队”1000余人,毙、伤100余人。

1950年7月15日至16日,第25军74师222团一部,在浙江北麂山岛活捉“浙江反共总队”总队长李东明等匪首,毙、伤50人,俘574人。

1950年11月20日,第21军61师183团2个连和部分民兵,在浙江玉环岛击溃窜犯之海匪“浙江人民反共武装军”5个纵队约1000余人,歼186人。

1950年9月1日至15日,第32军95师285团,在福建建瓯松溪山、乌老山歼“闽浙赣前线突击司令部”等部第3师6个多连。

1950年7月12日,第21军62师、军山炮团、华东军区海军温台巡防区各一部,在浙江披山岛歼“浙东人民反共救国军暨江指挥部”及“暨江总队”480人。

1950年12月1日,第28军84师252团一部和宁德县大队,在福建宁德县城平息了“大刀会”会匪1000余人的暴乱。

1950年12月2日至20日,福建军区第7军分区261团、第5军分区260团各一部,在福建清流江坊、长校、四堡歼“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第36纵队”236人。

1951年6月7日至8日,浙江军区第103师308团一部、师直炮连,在洞头、三盘岛歼“浙江人民反共武装驻瓯办事处”、“国防部独立第2支队”73人。

1950年11月16日至12月5日,第29军85师253团、福建军区第8军分区警备团,在福建连城清风山歼“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唐宗以下400余人。

1950年8月中旬,福清县大队在福建江阴岛歼海匪158人。

1950年12月,福建军区第8军分区259团,在福建上杭、长汀及闽赣边境地区之王坑山等地,歼“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第13纵队”200余人,毙匪首王乃文。

图例
主要剿匪作战区

1950年10月,福建军区第8军分区259团和地方武装,在福建上杭及闽赣边境地区的重庆山、王坑山、南山,歼“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第13纵队”司令林汉祥等300余人。

1951年1月18日至20日,福建军区第85师253团3营、第6军分区259团1、2营和永春、大田、安溪县大队,在福建漳平新桥、德厚歼“福建反共救国统一行动委员会”458人,毙副主任曾文光,副副主任张景清。

1950年8月1日、12日,第25军74师222团一部,在福建浮屠岛、西洋岛歼海匪118人。

1951年2月上旬至3月上旬,福建军区第5军分区260团、警备团等部,在福建德化湖洋、草美等地,歼“德(化)大(田)联防清剿指挥部”300余人,总指挥林青龙被围致死。

1951年2月上旬至3月上旬,浙江军区警备第1旅2团3营,在浙江洞头岛歼“江浙反共救国军”吕清祥部200余人。

华东地区剿匪作战示意图(第四阶段)

(1951年7月—1953年底)



1952年6月10日至11日, 第21军62师一部及守岛部队, 在浙江黄礁山岛击溃窜犯之海匪“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3大队1200余人, 歼310余人。

1952年5月28日至29日, 第21军62师一部及守岛部队, 在浙江白沙山岛击溃窜犯之海匪“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第4、6大队近千人, 歼200余人。

1952年10月9日, 华东军区公安第17师50团一部, 在浙江鸡冠山岛、洋屿岛击溃窜犯之海匪“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野战第1、4、5大队1200余人, 歼约100人。

1953年6月19日至20日, 华东军区公安第17师50团、第20军60师179团各一部及增援部队, 在浙江大鹿山、小鹿山、洋屿岛击溃海匪“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4、5野战大队等部1600余人, 歼736人。

1953年5月29日, 第20军60师179团、公安第17师50团、华东军区海军温台巡防大队各一部, 在浙江大鹿山、小鹿山、洋屿、鸡冠山岛, 歼“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第42纵队“司令何卓权以下239人。

1951年10月10日至11日, 浙江军区第104师310团、312团及台州军分区海防大队、华东军区海军温台海防大队各一部, 在浙江南江山、北江山等岛歼海匪204人。

1951年7月24日至8月21日, 浙江军区第105师及温州、台州、丽水军分区各一部, 在浙江雁荡山毙“浙江人民反共突击军”第7、28纵队陈杰以下173人, 俘129人。

1951年12月2日至3日, 浙江军区第103师309团3营及华东军区海军温台海防大队, 在浙江洞头岛毙、伤“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东纵队普山列岛前进指挥部”53人, 俘113人。

1952年1月11日至15日, 浙江军区第103师309团、第105师315团、华东军区海军温台海防大队各一部, 在浙江洞头、霓屿、状元岙岛, 毙、伤“国防部独立第7纵队”、“军官战斗团第13支队”等部328人, 俘620人。

1951年9月4日至19日, 第25军74师、福建军区第87师260团各一部, 在福建惠安、晋江、仙游地区, 歼“福建反共救国军”泉州纵队、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陈令德以下360余人。

1953年7月13日至14日, 福建军区水兵师第2团、第28军84师各一部, 在福建西洋、浮鹰、奎山、马刺、台山等岛, 歼海匪112人。

1952年2月25日至26日, 当地守备部队在福建漳浦赤湖城、东浦击溃窜犯之海匪“南海集训总队”及“突击大队”2000余人。

1951年12月7日, 第28军83师249团一部, 在福建南日岛击溃窜犯之海匪“福建省反共救国军南海纵队”4个中队500余人, 歼150余人。

1952年12月14日, 华东军区公安第80团9连1个排及增援之第31军91师272团, 在福建漳浦六鳌半岛击溃海匪“南海集训总队”、“突击大队”500余人, 歼100余人。

图例
主要剿匪作战区

西南地区剿匪主要战役战斗示意图(之二)

(1950年8月—1953年)

